

剖析雙語教學對技職教育之衝擊—以機械群為例

林宗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研究生

鄧朝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我國技職教育已行之多年，其中對於實作技術的訓練更是享譽國際，多次於國際技能競賽中嶄露頭角。更創造許多高階技術人才於產業之中，從如此豐厚成就得以襯出我國技職教育之成功。然而近年來我國政府推動 2030 雙語國家政策，並要求各級學校採用雙語教學，但在現行雙語師資不足情況下推行雙語教學，不但增加教師授課壓力，亦影響技術訓練的質量。在注重課程以學生為中心的當下，需要更加去思考在技職教育階段強行推動雙語教學對於學生是否有益亦或是造成更大的學習壓力，如同買櫝還珠。

二、世界各國推行雙語教育之背景因素

觀察當前世界各國，凡是成為雙語國家必有其特殊歷史背景，共同特徵皆為曾受英語系國家殖民過（劉源俊，2021），以下將分別敘述各國歷史及社會文化背景因素。

（一）新加坡

新加坡早期為馬來亞聯邦之一，於 1965 年獨立，自獨立後便將英語、華語、馬來語及坦米爾語等四種語言做為官方語言，該國雖然 95% 人口為華人，但他們所說的華語皆屬於粵語、閩南語、客家語等漢語系之方言，並非現今的北京語，而在殖民時期的殖民母國為英國，大部分人口對於英語並非陌生，為了讓各民族能有效溝通，新加坡政府決定實施英語教育，然而在新加坡政府開始實施雙語政策之後，研究發現新加坡學童雖然英語能力增強，但華語能力以及其餘本土語言開始逐漸萎靡，英語成為了新加坡的優勢語言（延晶，2016）。

（二）馬來西亞

同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馬來西亞，對於英語的接觸並不陌生，但國內人口多數為馬來人使用語言為馬來語，而第二大人口則為華人族群，使用粵語及閩南語，同新加坡一樣，為了各族群能夠溝通，因此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但相較於新加坡，馬來西亞更加有效的保留母語，華語以及馬來語在日常生活中仍就是經常使用之語言（匡導球，2015）。

(三) 菲律賓

菲律賓早期受西班牙殖民，政策以推行宗教為主，因此對於西班牙語之傳授較為輕視，殖民後期仍舊只有 2.4%的成年人會使用西班牙語。後續美國治理時期，因美國希望能夠透過語言及文化傳播美化菲律賓人，因此在英語教育的推廣上十分注重，直至獨立後以英語仍舊是以較高階層的語言存在於社會中。到 1987 年，菲律賓正式確立菲律賓語以及英語作為官方語言，而在教育政策上，菲律賓教育部發現當以母語作為基礎時，相較其餘英語等官方語言，學生得到的學習成效更大，因此命令一至三年級教學需要以母語作為主軸（謝國斌，2016）。

(四) 香港

香港在 1841 年受英國殖民統治 156 年後於 1997 年主權移交中共政府，這段時間裡在文化上很大的部分受到英國的影響，但因人口以珠江三角居民為多數，因此粵語成為了主要的溝通語言。在香港政權移交後，中共政府以「兩文三語」作為香港語文教育政策之核心，期盼能培養具備商業觀、國際觀之金融人才。然而香港雖然歷經英國殖民長期以來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但因為居民日常生活中仍是利用粵語進行溝通，缺乏使用普通話及英文自然環境，政府在推行英文及華語教育上窒礙難行，表面上英文測驗成績卓越的香港，實際上學生的語文水準卻在逐漸下滑（田小琳，2020）。

(五) 加拿大

加拿大比起上述各國是較早推行雙語教育之國家，雖然國內多數人之母語是法語，然而掌握上層經濟及社會權力皆是英語系人士，因此在 1960 年代法語士開始要求政府注重法語文化之重要性，最終於 1974 年成功將法語訂為官方語言並開始推行雙語教育。加拿大雙語教育利用了沉浸式教育，從幼稚園開始隨著學習階段的提升逐步增加學生在學校的法語比例教學，在歷經多年執行後，多數經歷過沉浸式教學之學生其語言能力大幅提升，在學科上也多有不錯之表現（王俞蓓、林子斌，2021）。

然而加拿大光鮮亮麗的雙語教學政策背後，隱藏的是更加嚴重的階級差異，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咸浩在 2022 年的「預知平庸與貧乏：反思「雙語國家」政策」論壇中提出，實際能夠擁有雙語能力的人不過 8%，而在社會中下階層之學生仍然接受純英文課程，雙語課程成為了社會上層家庭的專屬物品（許維寧，2022）。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各國在推行雙語政策的過程中，無論是加拿大的沉浸式教學或是新加坡的英語教育，其能夠成功的原因在於該地的歷史文化

中曾與英語系國家有過密切甚至共屬一國之經歷，在文化中早已留下了根深蒂固之影響，反觀臺灣雖然曾經受過荷蘭、西班牙、清帝國、日本等多國統治之力歷史，自西元 1640 年間，荷蘭船隊抵達臺灣並治理這島嶼開始，這座島嶼正式的被文字記錄下來，經過荷、西共同經營的這段時間，在臺灣所使用的語言除了原住民族語外，官方文件皆為荷語與西語，往後明鄭時期大批漢人來台後所使用的語言為華語系統中的閩南語，乃至清國統治後亦同，直至 1885 年清日戰爭後由日本殖民開始才轉為日文為官方主要語言，但民間仍有許多民眾是使用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溝通，到二戰後由國民政府接管使用華語作為主要官方語言至今從未與英系國家建立緊密之連結。

在教育部提出的我國推動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言政策評估報告中列出了適合的 9 項條件，然而其中並無任何一項與我國歷史脈絡亦或是現今情況相符合，在不具備推動條件下選擇強行推動雙語政策，是否有可能反倒造成學生本土語言能力之流失，或許需要更加深思。

三、雙語教學對於技職教育之衝擊及影響

(一) 技術型高中學生對於英語掌握程度

技術型高中的學生多數屬於偏科或是語文能力較不突出，甚至在英語學習的過程當中失去信心而產生抗拒（陳憶如、張惟權，2016）。根據測驗中心統計，近四年來的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有高達 7 成以上學生英文不及格（潘乃欣，2021）。原因或許來自於過去國中時期的學習挫敗導致學生對於英語文學習的自我效能不彰，在如此條件環境下，倘若在學生甫一入學便將原本就屬於陌生的專業課程用英語授課，在原先的隔閡上添加起一堵新的高牆，在聽不懂授課老師上課內容情況下，漸漸地對專業課程也失去學習動力，最後不僅語言能力沒有提升，更加失去本該能夠掌握之基本技術能力，得不償失。

(二) 技術型高中教師的外語教學能力

過去我國中等教師培養歷程當中並無特別強調外語教學能力，在教育檢定中是以國文以及教育專業作為測驗科目，在教師外語專業能力無法保證情況下，要求教師能完整的使用外語教學，且使用程度還須符合學生能力，是否能有效的將知識作完整的敘述傳達給學生恐怕需要打上一個問號，且技職體系不同於普通教育，英文課程時數遠低於普通高中，有多數時間屬於實習課程，而在實習課中多數是由教師親身示範一遍再交由學生實際操作，在實習課混亂且多變的環境下，要求教師利用自身並不熟悉之語言進行授課，無疑是給現場教師們添加額外的心理壓力及負擔。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當前工業技職教育中本就充斥著許多外來專業詞彙，起因在於臺灣早期進入工業時代是在日本殖民時期所開始，因此許多專有名詞是由日文衍生而來，而這些日文又是由英語轉變而來，而國民政府來台後仍沿用日本所留下之基礎，以致許多工業專有名詞仍保留日語型態呈現。另一方面，國內早期學習高等工業技術都是前往日本或德國留學，因此許多人在專業領域中習得外語為德語或日語，以致這些專有名詞的形成皆有日語色彩。

以技術型高中機械群為例，在該群科專業科目中，有許多專有名詞屬於外來語，學生在理論課程當中已對這些專屬詞彙的認知已有所建構，在實習課中，教師也會使用外來語詞彙，學生在這樣環境下無須刻意學習外語即將專有名詞作為連結。現代國際社會中能夠有效的英語溝通固然重要，然而當教師刻意在課程中利用更多的英語教學，反而容易激起學生對於英語學習之抗拒心理，又或是造成學習上習得無助感，進而失去學習動力，造成技術力、英語力雙輸之局面。

（二）建議

雙語教學之目的在於培養學生之外語能力進而提升國際移動力（國家政策發展委員會，2018）。但技術型高中機械群由於課程的特殊性及學生普遍英語能力較為低落，無法如同普通高中一般在各項課程直接加入雙語教學，因此教師身為推行課程的執行者，更需要以身作則，精進自己的外語能力並與學生共同學習，當學生察覺到即便身為教師仍需持續精進自身外語能力，在之後的課程推動也能更加有說服力，使學生認同學習外語之重要性。除此之外，與其課程中強硬加入外語教學造成抗拒學習之反效果，不如在平日校園生活中營造出雙語生活情境，例如教師課程中專有名詞以外語原文進行講述，以潛移默化的方式，讓學生能自然的使用外語進行溝通。

參考文獻

- 王俞蓓、林子斌（2021）。雙語教育的推行模式：從新加坡、加拿大的經驗反思臺灣雙語政策。*中等教育*，72(1)，18-31。
- 田小琳（2021）。三論香港地區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中國語文通訊*，100(1)，1-13。
- 匡導球（2015）。赤道之虎新加坡—從南洋碼頭到十強之國的進行式。臺北

市：高寶書版集團。

- 延晶（2016）。新加坡雙語小學生的優勢語言。《華語文教學研究》，13(2)，89-108。
- 許維寧（2022年4月9日）。雙語國家恐釀階級惡化 學者籲以加拿大、新加坡為鑑。《經濟日報》。取自 <https://money.udn.com/money/amp/story/122330/6224249>
- 國家政策發展委員會（2018）。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
- 陳憶如、張惟權（2016）。英文能力分級制度對技職校院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嶺東學報》，39，231-243。
- 劉源俊（2021）。「雙語國家」如夢幻泡影。《點教育》，3(2)，40-42。
- 潘乃欣（2021年5月23日）。2.3 萬考生統測英文低於 20 分 教師提 2 招搶救低分群。《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929/5479919>
- 謝國斌（2016）。菲律賓的族群圖像與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2(4)，55-79。

